

# 後殖民論述對女性主義教學論的啟示

洪瑞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領導與評鑑中心專任助理

##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衝擊著世界各地的教育，國內教育也逐步調整知識內涵與發展方向。然而，在這一波波全球化熱潮下，我們不難發現在所謂「全球化」或「知識經濟」符號底下，其實蘊含著「西方化」、「美國化」的意識型態，雖高舉「全球化」之旗，實則不可避免西方的文化霸權，欲將非西方社會收編納入高揚理性、科學的西方知識體系裡。全球化的「現代主義論述」與「大型敘述」正席捲世界各國，而二十世紀出現的後殖民論述，即是對這種西方優勢的知識論發展，展開強烈的質疑與挑戰。

後殖民論述學者巴巴（Bhabha, H. K.）接受廖炳惠訪問時表示，後殖民論述在學術圈中盛行的原因，絕大部分是因為有越來越多從殖民地出來的學者，如薩伊德（Said, E. W.）、史碧娃克（Spivak, G.）、法農（Fanon, F.）、還有巴巴本人，對本身的歷史、身份開始提出嚴肅的理論反省（廖炳惠，1992）。這些後殖民論述學者強調以被殖民的角度，對西方或主流殖民文化，進行反省、批判，並建構以被殖民者為主體文化的意識型態（陶東風，2000；Ashcroft, Griffiths, Tiffin, 1998）。這種打破西方優勢迷思、拆解主體與「他者」二元優劣對立意識、解構西方全球化單一歷史

發展進程、重視讓「他者」發聲的後殖民論述，為教育研究提供了另一條分析取徑，也為女性主義教學論的多元文化教育精神，提供了種族面向的另種理論思路。本文即先闡述後殖民論述與女性主義在理論概念上的異同與辯證，再論述女性主義教學論在涵容女性主義的同時，也應從後殖民論述的立場，同時解構可能帶來的知識論暴力。

## 二、「抵中心」思維連結了後殖民論述與女性主義

後殖民論述學者認為後殖民論述源自被殖民經驗，強調與殖民勢力之間的張力，並抵制殖民者的本位主義論述。換言之，後殖民論述有兩大特點：第一，對被殖民經驗的反省；第二，拒絕殖民勢力的主宰，並抵制以殖民者為中心的論述觀點（邱貴芬1992：154；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1989: 2）。因此，如果我們將後殖民論述納入一個更寬廣的文化思考空間，將發現它呼應了後現代批判論「抵中心」或「反中心」（de-centring）的傾向，兩者如中國學者李佩然所言，是「類同的」（宋國誠，2003：92），因為後現代批判論亦強調文化的多樣與差異性，主張「跨越差異的對話」（dialogue across differences）（張建成，2002：8），拆解「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主義論述和大型敘述，並以文化異質為貴。總體而

言，其「抵中心」論、「反中心」論一一解構各類中心論（包括男性中心論，異性戀中心論，歐洲中心論，白人中心論等等）的迷思，以及潛藏於此類迷思之中的政治意義，（Hutcheon, 1988），「抵中心」特質可謂後殖民論述、後現代批判論以及一系列「後學」的共通精神。

再論女性主義，其主張以往知識體系裡女性主體的失落與噤聲，是父權殖民「消音」的結果，而其「殖民」與「被殖民」、「主體」與「客體」二分階級的論述切入點，以及強調主體、差異、多元與異質的「抵中心」理論觀點，與後殖民論述及後現代批判論不謀而合。是以，薛曉華（2001）在〈抵殖民化的知識論與主體重構：女性主義教學論在後殖民論述上的蘊義〉一文中，將後殖民與女性主義教學論加以聯結，深入解析女性主義教學論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批判傳統以男性為中心而建立教育理論、認知發展、道德發展序階等，均忽略了女性的聲音與經驗，並進而主張反抗父權體制、「抵中心」的女性主義教學論的理念及關懷面向，特別是對知識的探討、主體的建構、以及差異的重視，其實充滿一種「後殖民」精神。

### 三、女性主義的「後殖民精神」之辯證

然而，究竟後殖民論述學者如何處理女性主義或者性別議題？不同性別意識的後殖民論述學者在兩者的立論觀點上，是否具有調整修正的差異發展？在著名的後殖民論述著作《東方主義》裡，未見薩伊德對社會階級及性別議題

有所著墨。雖然薩伊德幾次談到福樓拜時，曾以「福樓拜與妓女」，隱射「西方與東方」、「殖民與被殖民」、「強權與弱勢」、「西方將東方女性化」等意涵，認為此可作為東方主義性別分析的面向，但是Kennedy（2000: 41）口中的「性別盲」（gender-blindness）薩伊德，卻從未對這些現象深入分析明顯的性別宰制問題，甚至在他為《東方主義》接受訪問時，還表示種族是比性別和階級還要優先討論的課題，並不認為在有關東方主義的討論中，需要放入性別或階級議題（Kennedy, 2000: 37）。而且，薩伊德本身更一再於文本中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將西方與東方二分為男性與女性，對西方男性而言，女性與非歐洲地區的形象是差不多的，女性就等同於柔弱、等同於東方，而下筆則處處以西方男性的觀點與立場自居。另一方面，薩伊德所選的東方主義文本中，也從未見女性或東方作家的作品，因此，當薩伊德認為東方學專家將東方人經驗扭曲或排除時，其實他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過度強調西方白人男性經驗，而將女性（無論白人女性或第三世界女性）的經驗與文本，排除在他的論述之外。這無非是同樣落入東方主義一扭曲「他者」的窠臼之中。

面對這樣的性別意識，邱貴芬（1995: 59-60）指出早期有關殖民性別的討論，多如薩伊德一般，經常引用「殖民者=男人，被殖民者=女人」的譬喻，欲將性別定位問題與其他政經結構相連，討論性別分類如何被用來建構各種層次的權力關係。相對於殖民論述學者的「性別盲」，歐美古典女性主義論

者似乎也犯了「種族盲」，而且兩者均落入二元論述的化約謬誤。如歐美女性主義也常假設被殖民者與歐美女人有同樣的問題、等同的身份，於是在白種父權社會裡，「男性／女性」、「白種／有色」、「異性戀／同性戀」層級式的宰制結構是相類相連的平行壓抑機制，因此女人、有色人種和同性戀者可以彼此互相認同（張小虹，1995：40），諸此均無異地將殖民主義裡的各種矛盾都簡化為父權架構問題，然而一旦將「殖民者=男人，被殖民者=女人」的譬喻置於黑白種族議題時，便顯得處處捉襟見肘。

十九世紀黑人女性社會運動者 Sojourner Truth 的名問：“Ain’ t I a Woman?”（邱貴芬，1995：58-59），拆解了「殖民者=男人，被殖民者=女人」之簡化殖民與性別議題的化約謬誤，將種族與性別問題相聯結，複雜化批判殖民主義與父權體制時的論述內涵。就像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Fanon, 1967）裡，雖只在「跨種族」與「異性戀」的框架下探討種族與性別問題，但其一系列揭示種族與性別不能只在絕對二分、不能固守在西方凌駕東方的層級上探討，而應將種族與性別交叉討論的論述，卻已開啓了後殖民性別論述的大門，突顯了性別、種族、性慾取向間的交錯互動在理論化過程中開放出的可能性與侷限性。而史碧娃克在〈三個女人之文本與帝國主義批判〉一文中，更進一步進行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對話，認為第三世界婦女一直都被當成白種女人的下層陰影：她們被視為鞏固自我的「他者」，並被排除於女性個人的

主體建構之外。在帝國主義操控之下，白人女性的主體全是構築在其相對於第三世界婦女的種族優勢之上（李翠芬譯，1995；張小虹，1995：50）。被殖民女性身處的雙重壓抑：同時背負性別與種族的「他者」特質，日漸受到重視。

依循此脈絡，陶東風（2000：97-98）在《後殖民主義》一書中，遂以「女性主義還是新東方主義？」為標題，來探討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指出後殖民論述與女性主義兩個思想體系都關注對於統治結構中被邊緣化的「他者」的研究，都是以顛覆性別的、文化的、種族的等級秩序為己任，並利用後結構主義來否定男性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共同基礎：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但是，在此之前，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論述之間卻存在著嚴重衝突，主要是在探討「第三世界婦女」時發生的問題。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後殖民論述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例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便被批評為性別盲。而在後殖民論述學者看來，西方女性主義津津樂道的所謂「第三世界婦女」及其對於性別差異的強調，則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對於差異意識的預設，隱含一個文化等級：西方女性主義者是比第三世界婦女更優越的女性，她們擁有為「不幸的姊妹」指引解放道路的特權，因此當不同文化對立衝突時，勢力大的一方乃透過論述來「了解、控制、操縱，甚而歸納對方那個不同的世界」（Said, 1994: 2）；而被殖民的一方唯有抵制以對方為中心的論述，才有可能從被「消音」的



困境中解放出來，重新獲得主體性。

史碧娃克在《賤民能說話嗎？》一文中，就幾近義正辭嚴地指出，西方知識份子知識生產與權力架構上，均不斷有意無意地打壓抹滅那個相對於歐洲的無名異己，並把異己當作同質性處理，這種「知識論暴力」的作為在她看來簡直是為西方經濟服務（Spivak, 1988；引自楊麗中，1993：63）。從削弱西方的文化霸權和打破東西方所謂「邊緣」、「中心」的神話目的出發，作為一個解構主義女權批評家，史碧娃克不認為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女權主義，反對將「國際女權主義」（實質上是「白人女權主義」，亦即歐美古典女性主義）強加給第三世界，她呼籲人們關心第一世界以外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域的婦女狀況和經驗，提倡開展第一世界的女權主義放棄自己白人的、中產階級的、受過西方良好教育的種種特權，與第三世界的女權主義之間進行「協商對話」（曹莉，1999：113-115），進而將女權主義批評納入後殖民主義批評的日程表。而她也極力避免在研究非西方文化時，流於文化相對主義，她期許自己可以與這些「賤民」對話，而非僅是談論這些人（Kennedy, 2000: 132-133）。

#### 四、結語—女性主義教學論應同時解構後殖民主義與父權主義

回顧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交互辯證論述後，我們回到女性主義教學論富「後殖民」精神的主張上。從女性主義教學論的發展脈絡來看，其主要是源自對於大學教室中所提供的傳統知識內容與理論所作的回應，欲打破長期

以往對於男性白人精英的經驗與觀點所建構的知識論，而關注其他族群（包括女性、有色人種、工人階級等）的歷史與經驗（潘慧玲，1999）。因此，如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後學」潮流在「抵中心」、拆解壓迫等主要精神上，有其不可置疑的共通性；是以，若欲將後殖民精神結合女性主義以應用到教學論上，那麼同時解構「後殖民主義」與「父權主義」則是不可避免的過程，而這也是「後殖民女性主義」、「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論述著力點，如此女性主義教學論的發展，才能一方面掌握後殖民「抵中心」、重視族群、抗拒文化霸權等精神，另方面亦能避免潛藏的、無形的知識論暴力疑慮；換言之，這派觀點強調重視課堂中性別與其他壓迫系統的交錯作用，並探討這些交錯如何影響個體建構知識、如何討論他們的經驗以及如何在教室中進行互動。除了性別之外，種族也是他們欲解構的對象。女性主義教學論即在要求學生檢視自己與所學知識間的關係、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自己在建構知識過程中如何受到社會與政治力量的影響（潘慧玲、林昱貞，2000）。然而，如何如史碧娃克所言的：與賤民協商對話，巴巴所言的「仿擬」（mimicry）、「交織揉雜」（hybridity）、「再在地化」（relocate）出本土女性主義教學論的文化符碼，則是文化「全球在地化」後，教育工作者未來的重要課題了！

（本論文發表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主辦之兩岸四地教育改革的實踐與反思學術研討會）

## 參考文獻

- 李翠芬（譯）（1995）。G. Spivak著。三位女性的文本與帝國主義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外文學，24（5），7-21。
- 宋國誠（2003）。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台北市：擎松圖書。
- 邱貴芬（1992）。「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2），51-167。
- 邱貴芬（1995）。「你看我是女人嗎？」從「蝴蝶君」看後殖民性別問題的曖昧空間。中外文學，24（5），58-71。
- 曹莉（1999）。史碧娃克。台北：生智。
- 陶東風（2000）。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
- 張小虹（1995）。重塑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中的性別／種族政治。中外文學，24（5），37-57。
-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市：學富文化。
- 楊麗中（1993）。傅柯與後殖民論述--現代情境的問題。中外文學，22（3），51-72。
- 廖炳惠（1992）。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的訪談。當代，71，20-25。
- 薛曉華（2001）。抵殖民化的知識論與主體重構—女性主義教學論在後殖民論述上的蘊義。載於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師範院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主編，九年一貫課程與教育改革議題：教育社會學取向的分析。高雄市：復文。
- 潘慧玲（1999）。教育學發展的女性主義觀點：女性主義教育學初探。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527-552頁）。台北市：揚智。
- 潘慧玲、林昱貞（2000）。性別平等教育的概念與落實。未出版手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
- Ashcroft, B., Griffiths, G., & Tiffin, H.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 Ashcroft, B., Griffiths, G., & Tiffin, H. (1998).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Fanon, F.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from the French by C. L. Markmann trans.) . New York: Grove Press.
- Kennedy, V. (2000). *Edward Sai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aid, E. (1994). *Orientalism*.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